

论《浮游群落》中左翼知识分子的红色台湾想象

◎王士琼[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浮游群落》着重塑造了以林盛隆为首的这一类左翼知识分子。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的特殊性，林盛隆们的红色台湾想象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方面，有着台湾左翼自身力量的单薄和难以克服的缺点。刘大任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思想的书写承载了更多的反思和批判的色彩。在70年代风起云涌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和左翼思想的复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60年代台湾 左翼 红色台湾想象 缺失

《浮游群落》是台湾作家刘大任写于1978年^①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和痛苦、虚无中思考、挣扎和求索的过程。尽管最终这群知识分子的结局不是被逮捕就是远遁美国，或者投入新兴商业文化的怀抱，但小说所勾勒的6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风貌却为了解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形状、探寻70年代台湾的思想、文学转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学记录。

或许是基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小说着重塑造的是以林盛隆为首的这一类左翼知识分子。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于世界冷战的格局中，国共对峙，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被消音，通过实施“戒严令”遂行的白色恐怖依旧在持续中，威权统治的政治监控深入校园，“六0年代的年轻知识阶层普遍也有一种孤悬于历史之外、对于时局发展无能为力的感受”^②。小说中，外在的白色恐怖和内在的对国家和自身前途的茫然，促使林盛隆们上下求索，他们首先瞩目于西方哲学和现代主义艺术实践，试图从中找到人生和社会的答案。可西方哲学与艺术并不能祛除他们内心固有的黑暗和虚无，他们转而开始接触地摊上和旧书店里的30年代大陆左翼文艺、旧俄小说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文艺思想乃至毛泽东的著作，从红色中国和大陆现代文学的左翼传统中寻找抵达光明之地的文学、思想资源，并以此观察、认识现实的台湾，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在这样的知识建构下，红色大陆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至高理想，对这个世界的向往和想象不仅形塑了他们的中国认同和红色台湾想象，更构成了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行动的基础。

一般而论，左翼“存在两种形态，其一是社会运动的形态，其二是思想文化的形态，这两者一般都是互相结合的”^③。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的特殊性，林盛隆们的红色台湾想象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方面，包括文学和政治两部分。其中，大陆现代文学传统中的左翼进步文艺是他们由向外寻求的现代主义回归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引路人。胡浩年少年时就读于南京革命遗族学校，后在台湾一所大学里任助教，所学是明史，却至少阅读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端木蕻良的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被他认为是“念过的哲学书里最有用、最不卖怪的一本”^④。作为同人刊物《布谷》的主将，他的思想基础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对弱者的普遍同情。反观林盛隆，他的思想与行动则更为左倾。林盛隆在台北县一所中学教书。作为台湾本省人，他对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为有难以压抑的愤怒，对大陆人也不乏不满，在“五二四事件”中曾经撕下过美国大使馆的星条旗。身为普通的市镇小知识分子，林盛隆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充满反抗情绪，对现代主义远离台湾社会现实和苦难的无病呻吟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走近了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和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并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五人同志小组。他对大陆现代文学传统中左翼文艺的接受更多地表现为理论的阐释。在《浮游群落》中，林盛隆曾就“形式与内容”、“植根于现实”、“如何对待民族历史与文化”、“我们应该写些什么？为什么写？为什么人写？”等文学问题与小说中另一同人杂志《新潮》的主将柯因有过数次交锋。相对于柯因完全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立场，林盛隆立场鲜明地坚持着自己左翼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点。如在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论中，林盛隆就两部纪录电影为切入点，详细地表述了他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评和对现实主义的倡导。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大行其道，就是批评“台湾的现代主义，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的亚流”^⑤的作家陈映真的创作也深受现代主义影响。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国民党50年代反共抗俄战斗文学的反叛，“偏向表现孤绝、焦虑、失落等情绪，追寻自我以及诠释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等抽

象、普遍问题”^⑥,开启了威权统治下台湾作家对人的个体命运和深层心理的思考和探索;另一方面,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也只是插在花瓶里的一朵鲜花,不曾在大地上生根”^⑦,不敢也无法真正正视台湾广大的社会现实,只能在形式上进行诸多的实践,因此无法改变台湾现代主义内容的苍白。这也是现代主义文学60年代末在台湾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浮游群落》中,新潮社及布谷社的部分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甚至将现代主义变本加厉地演变成了“从月经带到三角裤,全部登台亮相”^⑧的“绝对超越无限未来主义”^⑨,就是60年代台湾文坛生态的一个显影。

林盛隆曾说:“文艺工作其实是推动其他一切的基础”^⑩。《浮游群落》中,针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流弊,林盛隆倡导的左翼文艺观是现实主义的、注重内容的、写工农兵的。毋庸置疑,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神,或理解为一种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⑪,产生于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首先面对的就是中国苦难的现实,它所背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这也决定了独属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从早期的“为人生的文学”到“革命文学”的倡导,从问题小说到“‘民族形式’论争中两种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酝酿”^⑫,对现代中国和中国现实的关注和书写从来就是其应有之义。反过来,现实的紧迫也促使着作家更热衷于与现实胶着的创作内容的推陈出新,尤其对于左翼作家而言,反映民族与时代的迫切要求与真切情状的内容创新更是自觉的艺术追求。到1943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首先阐述了两个问题,这也正是林盛隆在与现代主义的新潮社论争时所提出的“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⑬的问题,最终讲话明确提出了“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⑭,也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此后,被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改造过的左翼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⑮。由此可以看出,林盛隆们的左翼文学观既是对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艺的一种反驳,更是对中国大陆左翼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对红色台湾文学的一种想象。

但仅仅只有文学上的想象和倡导是不够的,在林盛隆们的红色台湾想象中,无论是对台湾社会与阶级现状的分析、对中国分裂历史的认识、对革命的向往,还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省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都基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阅读。这同样构成了他们红色台湾想象的政治基础。具体而言,这种阅读及其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小说中,林盛隆不只一

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台湾的社会现状。如在胡浩第一次参加的秘密读书会上,林盛隆就分析了大家共同的社会基础:“社会走向资本化(资本快速形成,现代无产阶级产业大军出现);社会结构变革→阶级关系两极分化,城市小资知分(徘徊、动摇、分裂)的两条路……与日益壮大的普罗阶级相结合,为他们的利益奋斗,此外没有第三条路。”^⑯第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在谈到台湾革命时,林盛隆首先分析了台湾与大陆70年^⑰隔阂所造成的台湾革命的特殊性,并由此认为:“台湾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的革命。目前是暴力夺取政权,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建立政权以后的事”^⑱。这种将台湾革命预设为两个阶段的构想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⑲如出一辙,显然出于林盛隆们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及对其思想的认同。第三,中国大陆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当他们发现日资工厂生产过程严重污染环境、侵害工人身体,预备酝酿工潮时,其思想与行动的路径是照搬20世纪20年代大陆的中国革命。即他们设想在工人中首先发现积极分子,筹办工人业余补习班,对之实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使之建立阶级意识,继之发展壮大,最后形成革命。这种想象可以说是完全借鉴了20年代中国大陆工运的发展道路。

最终,在小说中处于不断酝酿中的通向红色台湾的路径被强硬地截断。这自然源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严酷,也归因于台湾左翼(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身力量的单薄和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林盛隆们只有理论的空想,而没有真正的行动力。他们的红色台湾想象仅仅建立在一种没有实际调查研究的阅读和浪漫想象的基础上,对事实上的台湾工商农阶层缺乏深切地认识和了解,也并不试图首先去认识和了解,错误地将工作中心几乎全部置放在对理论的阅读和生搬硬套上。这种革命毫无实践和群众基础,注定是无根之木,毫无可行性。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群落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不满和关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幼稚、长于空想,怯于行动。与此相应,在《浮游群落》中,作者将大部分的笔墨都花费在知识分子一场场的论争与口头交锋上,里面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横空出世,无父无母。即使出现了母亲和父亲这样的角色,也是无名无姓的一闪而过,面目模糊。这一方面隐喻这群左翼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台湾是无父无母的思想上的孤儿^⑳,处境孤立无援;另一方面,这些出生于台湾中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父母尚且无法产生影响乃至相互交流,这种疏离的关系本身也印证着他们红色台湾想象的虚幻性。其次,林盛隆们对中国左翼文艺和革命思想的接受是错位的。如上所述,自

1949年以来,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两岸分治状态。这导致这群左翼知识分子所能接收的都只是大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左翼文学、革命的一些思想,而对其此后的发展一无了解,也缺乏省思。这也就是说,他们以大陆30年代至40年代的左翼文艺和革命思想思考60年代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尽管有其批判性和合理性,但这种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双重错位,客观上导致林盛隆们将大陆文艺和革命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导致他们过度美化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其视为梦想的乌托邦,自然无法反思乃至批判其弊病,从而使其红色台湾想象先天不足。以他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而论,他们只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直面现实的一面,而忽略了现实主义文学在大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政治化倾向乃至使文艺最终沦为政治附庸的恶果,主观上重蹈覆辙地陷入20年代末左翼文学重内容、轻形式的泥沼。第三,思想上的专制或自大。在小说中,几乎是每一次的争论,林盛隆都无法真正在理论上说服他人,而只能靠那些生硬的左翼、社会主义的词汇,甚至是用口号定义、批判对方,从而无法吸收他人思想中可借鉴的成分。例如在与新潮社柯因“形式与内容”的争论中,林盛隆就完全不接受柯因“形式与内容本是一体”的观点,而坚持将内容和形式两分化,并认为内容优于形式。林盛隆是一个“相当概念化的人物”^②,而在这样一个左翼理论的代言人或者载体身上,更多见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唯我独尊。他急切地试图让他人人都服膺于他的观点和看法,也不断尝试发展自己的“同志”,但从总体上而言,他的左翼理论都是大陆20年代至40年代的产物。漫说这些理论本身就被实践证明有修正的必要性,即使这些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也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但林盛隆无法觉察到这一点,在他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就完全否定了现代主义对台湾文学的积极意义,以标举普罗文艺、现实主义文艺的方式,宣示着他的红色台湾想象中,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枝独秀。仅仅就知识理论本身而论,这种单一封闭的理论建构就是有问题的。具体到马列毛思想,它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其他思想体系的合理成分、从而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由此,从林盛隆对待异己思想的态度上,一方面可以见出他对左翼思想接受的教条化、公式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批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中隐藏的思想专制的因素。

可以说,左翼在台湾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但作为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力量,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自己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刘大任当时已身处美国、历经对左翼梦想的幻灭,因此他对60年代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思想的书写承载了更多的反思和批判的色彩,这无疑在70年代风起云涌的台湾

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和左翼思想的复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 ①② 刘大任:《冬之物语》,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9页,第20页。
- ② 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7年版,第81页。
- ③ 黎湘萍:《另类的台湾“左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67页。
- ④⑧⑨⑩⑬⑭ 刘大任:《浮游群落》,三三书坊1990年版,第44页,第102页,第102页,第165页,第64—65页,第66页。
- ⑤ 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出发》,薛毅编《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0页。
- ⑥ 朱双一、张羽:《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页。
- ⑦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版,第114页。
- ⑪⑫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第2页。
- ⑬⑭ 纪怀民、陆贵山、周忠厚、蒋培坤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547页,第572页。
- 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 ⑰ 此处指的是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被国民党统治20年(至60年代时),共计70年。
- ⑲ 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将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 ⑳ 尽管他们那时能够在地下偷偷阅读大陆的左翼文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但由于国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湾左翼的整肃和扑杀,兼之其时与大陆事实上时空的隔离,这群知识分子仍是小众的,在思想上处于孤立的境地。

作者:王士琼,厦门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台湾文学。

编辑:郭子君 E-mail: guozijun0823@163.com